



凯瑟琳·霍尔： “把自己嫁给中国”的新西兰友人

为穷人看病的“何先生”

吴耀明

凯瑟琳·霍尔(Kathleen Hall)是一位新西兰女护士,上世纪20至40年代在中国工作十几年,帮助白求恩和八路军购买运输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凯瑟琳·霍尔

1896年,凯瑟琳·霍尔出生于新西兰北岛的纳皮尔市,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当过教师,她在家中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五,先后在家政学校、医院接受教育培训,成为一名专业的护士。1922年,她接受新西兰圣公会派遣,来中国从事医护和传教工作。学习了一年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后,到北京协和医院从事护理和教学工作,其间她跟随布道团深入山西、河北的贫困山区,为当地百姓治病。在目睹了中国的贫穷落后,霍尔对穷人的疾苦非常同情,决心要尽自己全力帮助他们,于是放弃在条件较好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工作,先后到落后的山西大同、冀中河间教会医院工作。

1927年,霍尔来到冀中安国圣公会医院担任护士长。在医院男院新建完工后,她拿出自己的积蓄来增建女院,以改善当地妇女的就医条件。霍尔主持了两期护士培训班,亲自授课,共培养出60多名医护人员。1933年,她到曲阳、唐县的乡村做巡回医疗,5个月中出诊400次,为3000多位村民看病。她看到农村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农民生活条件差,进一步坚定了为穷人服务、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理念。20世纪30年代,黑热病、天花、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在安国肆虐,严重威胁当地百姓的健康和生命。霍尔带着医疗救护队,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千方百计防治这些疾病,被当地人称作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为了能长期帮助穷人,1935年,霍尔在曲阳县宋家庄、唐县牛眼沟建起两座诊所。为了方便与中国人沟通交流,她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何明清”,当地人都尊称她为“何先生”。她经常住在山里,讲着当地方言,出诊时一个人背着药匣不分昼夜地走,有时要爬几十里山路,却从不叫苦叫累。霍尔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不论穷富。她对看病的人说:“给穷人看病不要钱,帮助穷人不是为了钱。”村民们都说“何大夫不怕脏不怕累,是个好人”“何先生在这里做的好事数不清”。除了治病救人,霍尔还倡导文明生活,帮助村民学习公共卫生知识、树立个人健康常识,开展启蒙教育,让村民们识字、学习一技之长。她和蔼可亲的态度、高超精湛的医术和无私助人的精神得到了村民们的敬佩和赞赏。

帮八路军运送药品的“战地天使”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霍尔目睹了日本人烧杀抢掠,对侵略者无比痛恨、对中国人民更加同情,当她看到八路军为保护人民浴血奋战后,从心里由衷钦佩这支军队。宋家庄诊所与晋察冀军区总部相距几十公里,1938至1939年,霍尔经常到聂荣臻司令驻地汇报情况。聂荣臻对她讲:“你信上帝,我们共产党也

军购买药品物资并运送回来,霍尔答应了这一充满危险的请求。白求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遇见了一个天使,她将上北平买药品器材,并且把它们为我们带回来!”

霍尔利用外国人身份的便利,不畏艰辛、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军一道道封锁线,去北平购买并运回药品、医疗器械、无线电器材等物资30多次,为边区转移爱国抗日人士和医务人员40多人,极大地缓解了八路军缺医少药、医务人员不足的状况。在她帮助转移到边区的人员中,就有后来成为柯棣华夫人的郭庆兰,几十年后郭庆兰仍心怀感激地说:“我感谢何明清,是这个外国人把我领上了中国的革命道路。”

霍尔帮助八路军的行为,令日军对其恨之入骨。1939年7月,日军发动扫荡,把宋家庄诊所付之一炬,也将她扣押并驱逐出中国。霍尔不得不离开服务了十几年的中国。9月,她到香港时与宋庆龄取得了联系,提出了继续为中国服务的要求,宋庆龄安排她跟随红十字会一支押送药品的医疗队前往八路军总部。经历了半年多的艰难旅程,终于接近目的地,但不幸的是霍尔这时病倒了,不得不停止这次行程,回国休养。

永远的中新友谊桥梁

1941年,霍尔回到新西兰,多次寻找机会准备返回中国,但因各种环境限制一直未能如愿。在新西兰,她致力于中新友好活动,和著名记者贝特兰等在惠灵顿组建了中新友好协会惠灵顿分会,1958年又组建了全国性的中新友好协会,后又任该协会奥克兰分会执委,在新西兰宣传真实的中国、发出友好的声音。

1960年,霍尔受邀来华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活动,受到了周恩来、宋庆龄、聂荣臻等老朋友的接见,并来到了石家庄为白求恩扫墓,重访了安国医院,勉励医护人员学习白求恩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1964年再次来中国访问,重访了大同。1970年4月,霍尔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终年74岁。霍尔一生未婚,她曾经说过:“我把自己嫁给了中国。”路易·艾黎称赞霍尔:“她的伟大之处在于伟大的牺牲,来之于兵荒马乱的病苦年代。她以爱和温暖和普通中国人民一起工作,这是真正的国际主义。”1990年,聂荣臻元帅为她写下了“救死扶伤,英勇献身,支持抗战,青史永存”的题词。1993年,霍尔的骨灰遵照她生前遗愿安葬在宋家庄莲花山上和曲阳县烈士陵园。在宋家庄,当地人把小学以她的中文名字命名为“何明清小学”,重建了“何明清诊所”,在保定市修建了“何明清纪念馆”,中新友协还设立了资助中国贫困家庭女学生的“何明清纪念奖学金”。霍尔已经成为中新友谊坚实的桥梁,她的事迹镌刻在中新交往的史册上,她无私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将被中新两国人民永远怀念。

据《学习时报》

刘文典崇拜陈寅恪

“这是刘某人!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差得远。”

刘文典与陈寅恪相识于1927年,后来二人同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导师。随着接触的频繁与了解的深入,刘文典对陈寅恪越发崇拜。在刘文典看来,“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只要向陈先生请教,总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每当刘文典有学术成果时,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向陈寅恪先生报告,“曾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

1939年,刘文典出版学术著作《庄子补正》(十卷)时,陈寅恪特意作序,说:“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

著名学者刘文典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研究《庄子》的专家。每当给学生上《庄子》课,他第一句总会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当然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若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向他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文典自负地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另一个就是我刘某人。”

刘文典虽然狂傲,但对陈寅恪却敬重有加。有一次,在课堂上,刘文典对学生说:“我对陈先生不是十分敬佩。”学生一片愕然。隔了一会儿,刘文典加重声音道:“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是十二万分的佩服。”他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竖起小拇指说:

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陈寅恪的评价一出,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获得了“庄子专家”的美誉。

在西南联大时,昆明经常遭遇日军突袭,师生们到处跑着躲避。有一次,刘文典跑警报时,忽然想起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不便,便带领几个学生匆匆赶赴陈寅恪的寓所,一同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刘文典,刘文典不但不让,还让学生搀扶陈寅恪先走。他大声叫嚷:“我要死了,大不了没人讲《庄子》。陈先生是国粹,还是保护国粹要紧!保护国粹要紧!”

王剑 据《人民政协报》